

“物质利益难题”:马克思怀疑启蒙的最初理论环节

——从国内的一个争论开始说起

黄学胜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市 200433)

摘要:“物质利益难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马克思缺乏对“经济事实”的首肯,而在于他顽固地坚持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建构主义世界观,这是其《莱茵报》时期的基本思想立场;而这一立场又关联着能否对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性质作出正确判定。在这方面,列宁的“两个转变论”是有失偏颇的。论文力图论证这一点,指证马克思当时思想性质方面的理想主义倾向,并强调联系启蒙来理解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历程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物质利益难题;启蒙;理想主义;思想性质;当代语境

中图分类号:B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2-0093-05

一、引言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物质利益难题”是其思想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这已得到了学界的公认,然而,关于何为“物质利益的难题”及马克思为何会感到“为难”却存有不少争论。吴晓明先生早在1994年就对此进行了研究^[1],并在《形而上学的没落》中总结说,物质利益所以成为“难事”不是“物质利益问题本身使马克思感到困惑和为难”,而是“物质利益问题向他单纯理性的世界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可以说是给予了重重的一击),而这种理性世界观却很少能够直接对‘物质利益’问题作出有内容的判断,在问题的解决方面甚至是完全无能为力的”^{[2]429}。对此,段忠桥先生提出了疑义,认为“这种理解很大程度上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3]。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相关文本进行上下文分析的基础上,段先生指出:“马克思所说的他遇到的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指的是他因缺少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而难以对涉及物质利益的争论和讨论发表意见。”^[3]段先生所以重视此问题,原因在于他力图提醒学界在研究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进程时不能局限于哲学领域,而应看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完成的”^[3]。这其实是对学界过多重视马克思在哲学方面实现的变革,而过多强调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对其他思想

资源的吸收和批判的学术倾向的一种间接批评。

笔者对这一用意并无异议。然而,就“物质利益难题”而言,段先生的观点却不能构成反对吴晓明观点的理由,因为,说马克思“因缺乏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而难以对涉及物质利益的争论和讨论发表意见”,与说“物质利益对马克思当时的理性主义世界观构成挑战,而理性世界观在问题的解决方面是无能为力的”,意思其实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强调马克思当时思想中缺乏的部分,而后者则强调马克思当时思想中具有的部分;前者主要从后来的经济学维度,而后者则主要从已经具有的哲学世界观维度对此作出阐释。笔者以为,在研究“物质利益难题”问题上,应坚持基本的思想史研究立场,即应从马克思当时所坚持的总体的世界观或思想立场角度出发,而不能以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倾向解释前面的思想困境,否则就不能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当时所遇到的具体问题,更不能理解他往后的思想努力方向及其根本原因。其实,坚持从哲学世界观角度理解“物质利益难题”并不与重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相矛盾,它们都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而仅从缺乏经济学的研究来理解马克思所感到的“为难之事”,则至少不能有力说明马克思为何接下来撰写的“第一部著作”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不是马上进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因此,这里如何本质地理解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

* 收稿日期:2009-05-13

作者简介:黄学胜(1983-),男,江西赣州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哲学及哲学基础理论,近代西方哲学。

思想立场以及“物质利益”又如何挑战了这一立场才是问题的关键。

物质利益问题不仅是马克思思想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当代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现代性问题。马克思对此问题的讨论不在于他缺乏对“经济事实”的首肯,而在于他顽固地坚持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建构主义世界观,这一世界观不仅是面向黑格尔的,从而成为了马克思继承和批判的思想资源,而且也是面向整个现代世界的,从而强调现代世界的方方面面都应在理性的法庭面前获得审判并最终被置入理性主义的合理秩序当中。这是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及此前)思想上的基本立足点,也是他看待“物质利益”问题的基本立场。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的那样,“物质利益”问题却以其不容置疑的形式无情地击破了启蒙主义的“理想”面纱,这让马克思感到了启蒙主义在现实生活面前的无能为力,从而导致了他的信仰危机以及随后的对启蒙的反思和批判。马克思的这一立场决定了我们能否对其《莱茵报》时期的思想性质作出正确的判定,在这一方面,列宁的“两个转变论”,即认为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4]59},是有失偏颇的,笔者力图论证这一点,指证马克思当时思想性质方面的理想主义倾向,强调联系启蒙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历程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二、“物质利益难题”再释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及此前)的基本立场是启蒙的理性建构主义的,即坚持用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观点评价和规定现存的社会政治状况,提出人的社会生活和活动应理解为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强调理性精神对现实状况的批判和推动作用,强调新闻出版、法、国家都要符合理性,符合人的自由的类本质,符合“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因此,对那时的马克思来说,启蒙的理性法庭是其评判和规定其他一切的思想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遭遇了“物质利益难题”。

马克思最初受到的思想影响正是启蒙主义的。他的父亲受到过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广泛地阅读了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者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著作,他不仅衷心敬仰法国革命思想的始祖——启蒙主义者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狄德罗,而且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头脑中充满了启蒙运动的自由进步思想^{[5]23}。显然,父亲对启蒙思想的崇拜、进步的自由主义思想、亲法的态度和自然神论的宗教观注定会对马克思产生耳濡目染的影响,并在他一生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马克思在那里生活了六年的特利尔中学,也是一个盛行着自由主义启蒙精神的地方,那里的数学教师施泰宁、希伯来语教师施涅曼都是启蒙精神的信徒,特别是校长维登巴赫更是一个康德哲学的信徒,

他尽力想使他的学校的教学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原则上。在这一氛围下,马克思对启蒙的接受是不言而喻的。此外,被马克思称为“父亲般的朋友”的华伦,也是一位崇拜古代文化并具有极高修养的伊壁鸠鲁主义者。马克思少年时期曾经常拜访华伦家,并对他终身报以“子弟之爱”。梅林认为,正是在“维斯特·华伦家的老宅子里”,马克思获得了他父母家所不能给他而学校更不能给他的精神食粮^{[6]15-16}。对此,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献词中这样写道:“您,我的父亲般的朋友,您永远是我的一个活生生的证据,显明地证明着,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一种真理。”^[7]华伦对马克思的影响正是他唤起了马克思的理想主义情调,而这一倾向一直延续到《莱茵报》时期并成为其思想性质的基本倾向。

马克思最初以著作形式反映启蒙的影响可见于《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日本学者成塚登认为,此文的思想出发点,“就在于法国的启蒙思想”^{[8]17}。这里,“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人和理性的信任”,也正是在此文中,马克思提出了用其一生孜孜不倦追求的启蒙理想:“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9]459}。科尔纽也认为,这一点充分“证明了启蒙人道主义对他的深刻影响”^{[10]96}。这种影响还体现在《博士论文》中,在那里,马克思极力肯定和弘扬了自我意识哲学,这正意味着肯定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意味着肯定启蒙时代的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他看来,在伊壁鸠鲁那里,“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7]10},因此他充分肯定了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说”对“偶然性”的肯定;他还特别重视伊壁鸠鲁的反宗教思想,盛赞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7]48};此外,他还提出要“对普鲁士国家进行理性主义改造:“一定的国家对于异国的特定的神灵来说,就同理性的国家对于一般神灵来说一样,就是一个这个神灵停止其存在的地方。”^{[7]94}马克思认为,在奉理性精神为基本精神的启蒙了的国家,宗教是不必要的,在那里,一切神灵都要停止其存在。

马克思的这一立场同样延续在《莱茵报》时期。如果说此前马克思思想特征还带有哲学探讨的理论外观的话,那么此时,他已接触了社会现实并用其所坚持的思想立场展开了社会现实的政治批判。这首先体现在对出版自由的捍卫上。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他揭穿了当时普鲁士政府的“伪自由主义”面纱,提出“国家应该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实现”^{[11]14}。法律应体现公民的普遍自由和平等;书报检查令不过是对公民的自由和平等的扼杀,是对团结的破坏,是“恐怖主义的法律”^{[11]16}。而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马克思更明确强调,自由是“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而不是特殊等级和个别人物的“个别属性”^{[11]58};法是“事物的法的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11]139}，“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11]71}。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对各

等级展开了批判。此时,等级的利益问题首次进入了他的视野,但他坚持认为,这是不合理的,而相信启蒙理性建构主义能将等级利益统合在更高的理性主义法和国家中,从而使普遍利益最终获得实现。在这里,马克思的国家观是和黑格尔的国家观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国家是“合乎理性的社会存在”,它教育自己成员的办法是“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成员,把个人的目的变成大家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变成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的自由;使个人和整体的生活打成一片,使整体在每个人的意识中得到反映”^{[11]118}。这正是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充分体现,这也是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看待和评判一切事物的价值立场。他整个《莱茵报》时期都顽固地坚持着这一立场。

正是在这一立场上,马克思直面了“物质利益”问题。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与此前一样,他坚持用理性主义国家和法的观点来评判各等级对自身利益的坚持和对人民利益的忽视。当时等级议会辩论的中心问题是:是否应当把穷人的捡拾枯枝视为“盗窃”?是否应当保护贵族等级的习惯权利?以及是否应当设立终身的林木看守人来保护林木占有者的利益?等等。马克思看到,捡拾枯枝已是穷人的一种习惯权利,是生活的基本保障。但林木所有者却站在自身利益立场上,主张将穷人捡拾枯枝的行为定为“盗窃”,并制定“林木盗窃法”,还要求为“被窃林木的价值”确定“惩罚的标准”,不仅要求一般赔偿,还要求特别赔偿,并要求“终身任命林木看守人”,从而剥夺了贫苦人民的基本生活权利。由此,马克思看到了黑格尔主张的等级议会并不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仅是维护各等级的特殊权利和习惯。马克思还看到,在维护特权方面,等级代表还处处以林木占有者的物质利益为中心,要求“国家”和“法”体现和服务于他们等级的特殊利益,要求“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占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11]160}。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仅受到了“最大侮辱”,还被“贬为私人利益的工具”^{[11]155},国家权威变成了“林木占有者的奴仆”,而法则成了维护私人利益的手段,“对私人利益有害的法,因而也就是具有有害后果的法”^{[11]165}。

马克思坚持认为,国家应平等对待和保护每一位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他此时对物质利益极为轻视:“利益就其本性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难道不法可以颁布法律吗?正如同哑子并不因为人们给了他一个极长的喇叭就会说话一样,私人利益也并不因为人们把它抬上了立法者的王位就能立法。”^{[11]179}显然,马克思还未像后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那样看到物质关系对国家和法的基础地位,而仍然认为私人利益应服从理性主义的国家 and 法。因此,他批判林

木盗窃法是“下流的唯物主义”,是“违反各族人民和人类的神圣精神的罪恶”^{[11]180}。然而,通过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实际接触和分析,物质利益问题却又让他无可辩驳地相信,在这场利益与法和国家的较量中,利益取得了完全胜利,“应该为了保护林木的利益而牺牲法的原则呢,还是应该为了法的原则而牺牲林木的利益——结果利益占了法的上风。”^{[11]179}“为了保证自己对森林条例违反者的控制,省议会不仅打断了法的手脚,而且还刺穿了它的心。”^{[11]178}此时,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启蒙理性和人道的绝对原则在现实的物质利益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不是启蒙理性的“应当”来规制“现实”的利益关系,倒是相反,是现实的物质利益关系决定着被视为作为普遍理性的法和国家。

可以看出,正是这一结论导致了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物质利益难题”。“难题”之所以称为“难题”,在于它冲击了他的整套启蒙价值观及其对启蒙的信奉和坚持。换言之,让马克思感到“为难”的根本原因是,“物质利益”问题与他所坚奉的启蒙主义世界观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一方面,启蒙主义自信通过合乎理性的法和国家能突破个人利益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实现普遍利益;另一方面,物质利益又无可辩驳地证明启蒙主义的各种努力都将归于徒劳,它自身具有不容置疑的至上性,而这一矛盾对当时的马克思来说是无力解决的,因此他便倍感“为难”和“苦恼”。为了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了书房”的马克思从事的第一件事就是考察黑格尔法哲学的根本局限性,从而展开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通过这一考察,马克思揭示了黑格尔法哲学的观念论本质,看到了现实社会经济关系才是国家和法的基础,因而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重要结论。从此,马克思便展开了对启蒙的反思和批判,并进行了政治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批判和哲学批判等,从而最终创立了唯物史观。反而观之,“物质利益难题”正构成了马克思怀疑启蒙的最初理论环节。

三、思想性质的本真追问

坚持马克思此一时期的启蒙主义立场,涉及到对马克思此时的思想性质能否作出正确判定。在这方面,列宁所主张的“两个转变论”,即认为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4]59},是有失偏颇的。马克思这一转向并未实现,而是依然坚持启蒙的理性建构主义世界观,它本质上还是理想主义的。

仅仅把马克思的思想性质归结为“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是“革命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并无太大意义。其最好的结果不过是认为,他已开始走出黑格尔,具有了辩证唯物主义特点(但马克思并没有完成这种转变,特别

是在辩证法和理性主义国家观方面)。事实上,阿尔都塞早就指出,这一区分,乃是把马克思思想还原为“成分”,是对马克思总体思想的“肢解”,是一种“分析目的论”的解读方法,这其实就是用“成熟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法庭,目的论的法庭,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作出判决,决定把这些著作肢解为成分,只能破坏它们的整体性”^{[12]37}。因此,他认为,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各阶段作为一个“有机的思想整体”来看待,并把握他的“总问题”,惟此,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各阶段的思想发展。阿尔都塞的这一观点无疑为我们指明理解马克思各时期著作的基本方向:把握马克思的总问题乃是至为重要的。

但阿尔都塞又认为,1842至1845年间的理性共产主义阶段,马克思的总问题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总问题。这就把《莱茵报》时期也归于费尔巴哈总问题下了。不同于此,笔者以为,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总问题是继续坚持启蒙的理性建构主义世界观,是用启蒙的原则立场评价社会的现实状况,这其实还是站在黑格尔法哲学的观念论立场上的。综观《莱茵报》的著作,启蒙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等思想得到了最为明显、最为根本的确证,而人本主义不过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普遍具有的理论共识。关于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确于1841年6月就已经出版,并且提出:“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宗教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等思想,并且根据恩格斯后来的说法,这部著作的出版“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就一下子消除了这个矛盾。……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了,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像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像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13]222}但如果就此认为马克思此时已经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有失偏颇的。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恩格斯接着这个论断所说的话就明白了。他说:“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13]222}恩格斯更主要强调《神圣家族》中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因此,不能将此无限制地推至《莱茵报》时期。在这一点上梅林的判断是正确的:“在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那些文章里,还看不到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只是在《德法年鉴》上才第一次表示‘热诚地欢迎’这个新的世界观,虽然也做了某些批判性的保留。”^{[6]72}事实上,在1841年—1843年3月期间,马克思根本没有运用过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原理,既使是在1842年3月20日马克思致卢格的信中,他自己说:“我不免要谈到宗教的一般本质;在这个问题上,我同费尔巴哈有些争论,这个争论不涉及原则,而是涉及对它的理解。不管怎样,宗

教是不会从这里占到什么便宜的。”^{[14]124} 这里的原则也不是唯物主义原则,而是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就已暴露的,其实也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一致的在宗教上的“无神论”原则,马克思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一样是把《基督教的本质》看成批判宗教的无神论宣言,而并未明确认识到这部著作反对宗教和思辨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质,而无神论并不就是唯物主义,这无需进一步论证。宗教神学批判本质上还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主题。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性质也是启蒙主义的“理想主义”性质,表现为用“应当”来规制“现有”,并强调两者的相互作用,而并没有像后来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后期的著作那样,看到市民社会的社会结构问题是国家和法等理念的现实基础。因此,将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著作定性为“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是一种误判。

这种误判同样体现在政治立场的判断上。马克思此时的政治立场是革命民主主义(也即资产阶级革命),还未转向共产主义。只有在遭遇了物质利益的难题后,这一转向才有了可能。但也不是马上转向了共产主义,而是在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后,才实现了这一转向。

马克思直面共产主义的问题是在《莱茵报》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战中。《奥格斯堡总汇报》谴责《莱茵报》具有共产主义倾向,攻击“‘莱茵报’是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毕竟是一位向共产主义虚幻地卖弄风情和频送秋波的妇人”^{[11]30}。为了应答这一指责,马克思一方面承认共产主义已经“具有欧洲的意义”了,“现在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事实,……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11]31}。他反问道:“难道我们仅仅因为共产主义不是目前的沙龙问题,因为它的衣服不洁和没有洒香水就不应该把它当作目前的重要问题吗?”^{[11]31}但另一方面,由于他的眼界还受到黑格尔法哲学及启蒙主义限制,也未对欧洲的共产主义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因此,他当时表示,“‘莱茵报’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就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都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彻底批判了这种思想。”^{[11]33}不能据此认为,马克思这里的批评是站在后来的“科学”立场批判这里的“空想”性质,他此时还未形成这一评判的标准,至多像尼·拉宾所认为那样:由于“社会主义的正面纲领也经不起严肃的批判”,所以,“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是不予重视的”^{[5]83-84}。但笔者以为,这里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马克思当时还受限于启蒙的总问题或总视域,还相信近代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想(理性国家和法),还以为经过理性改造之后的国家和社会生活状况就能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平等,能保护所有人的基本权利,能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因此,他还不可能看到欧洲共产主义的合

理性,其注意力还集中于用启蒙的价值观评判和规定社会现实状况,即仍然力图实现启蒙意义上资产阶级革命。只有当他遭遇了物质利益的难题之后,共产主义问题才正式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野,因为只有在此时他原来所依凭的启蒙思想资源才出现了危机,而他又只有寻求新的理论资源。随着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深入研究,他发现,共产主义乃是对资产阶级启蒙的一种推进,而正是这一推进让马克思看到了共产主义思想所具有的重大的社会历史意义。概言之,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立场是启蒙的理性建构主义的,政治立场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而思想性质上则表现为理想主义。

四、结 语

认清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思想立场是启蒙的理性建构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可借启蒙这一视角解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使“马克思如何应对和处理启蒙问题”成为一条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主线;由于启蒙本身又是一个总的问题域,所以又要求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应总体地看待他所实现的哲学变革,而不能片面重视于某一方面,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本身所要求的。事实上,考察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也应从其所处语境和时代背景,及他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才能更好地理解思想家本人提出的问题及其理论意义和价值,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它本质上还是受启蒙全面影响的时代。因此,以启蒙为视角解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另一方面,“启蒙”话题已成为当代我国的热点问题,当代中国社会并未走入“后”启蒙时代,其实还与启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社会现状上呈现出18、19世纪欧洲社会相似的情况:各种现代性问题比如个人主义、功利主义、道德沦丧,利益至上等等正日益喷发出来。马

克思哲学正是在应对这些问题过程中生发和创建起来的,因此,积极介入当代中国的启蒙思潮,正确看待和处理当代的诸多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寻找必要的思想资源。这里的关键问题就在于系统地探讨马克思哲学与启蒙的关联性、差异性和超越性,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进而在当代语境中发掘马克思哲学的积极意义。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 [1] 吴晓明.“理性的法”和“私人利益”——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所面临的物质利益难题[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5):35-42.
- [2] 吴晓明.形而上学的没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3] 段忠桥.《莱茵报》时期使马克思苦恼的“疑问”是什么[J]. 学术研究,2008(6):32-36.
- [4] 列宁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5] (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M].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2.
- [6] (苏)梅林.马克思传:上卷[M].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7] 马克思.博士论文[M].贺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 [8] (日)成塚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0] (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M].刘丕坤,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12]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责任编辑 刘荣军

Material Interests Knot: the First Theoretical Step of Marx's Doubt of Enlightenment

——A Discussion from a Debate in China

HUANG Xue-she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of “Material Interests Knot” is not Marx’s lack of admission of “economical facts”, but that he holds on the world view of enlightenment stubbornly. This is also the basic idea position of Marx’s “Rheinische Zeitung” period; and this position linked to whether we can make the right determination on the Marx’s ideological nature in this period or not. In this regard, Lenin’s “two changes” are not exactly righ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nature of Marxist ideology was ideal tendencies, and stresses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course of young Marx’s thoughts development with the links to the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material interests knot; Enlightenment; idealism; nature of thoughts; contemporary context